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

张 丽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但又研究甚少的问题。本文拟对当时难民的数量及其构成、难民入港后的境遇、香港方面对难民的态度以及难民潮对香港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 难民入港的基本情况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一年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战区许多企事业机构被迫迁移,不少百姓也拖家携口投奔相对安全的地区。地处华南一隅的香港,是难民迁徙的目的地之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香港成为避难地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香港靠近大陆,交通方便;其二,它地位特殊,暂时尚无遭受日军进攻之虞;其三,香港是一个经济基础较好的港口城市,对外联系相对便利。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内地百姓、工商业者及文化人涌入香港,形成规模空前的难民潮。

抗战时期,内地难民入港相对集中在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这一段时间。七七事变后的一年里,难民数量随沦陷区扩大而逐渐增长。不包括铁路和轮船运输统计数字,1937年入港移民人数为111000人,1938年上半年为74000人;而在1927—1936年的

10 年间,年均入港移民(铁路和轮船的统计数字除外)只有 1100 人。^① 另据来自铁路和航运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7 月,香港人口净增加近 25 万人。^②

1938 年 10 月日军进攻广东,导致短时间内难民数量急剧增多。新的难民沿陆、海两线源源不断进入香港。1938 年 11 月底,由于日军向粤港边界推进,大批难民,躲入新界。八乡机场很快人满为患,村庄里也涌进不少难民,总计新界地区共有难民三四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香港政府规定以大埔、八乡、元朗一线为界,不许难民越界向南移动,并出动警察加以监控,将这批难民拦截在新界地区。^③ 海路上的情形更为严重,难民入港高峰时期,每天有一二千人乘船到达香港。仅 1938 年 10 月,乘船入港者比离港者多 16000 人。^④ 同年 12 月 23 日,香港总督报告英国殖民地部称:“来自各港口——主要是澳门港的难民仍然在乘船入境,并呈增长趋势。近两个月,入港者比离港者多 9 万人。港岛和九龙新增人口约 25 万至 50 万之间。”^⑤

短短几年间,进入香港的难民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正如香港政府所称,中国抗日战争对香港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香港人口因难民涌入而激增。^⑥ 据统计,1939 年 9 月香港人口超过 200 万^⑦,其中内地难民占有很大的比例。尔后,由于战局相对稳定,有些难民冒

① 《香港总督致英国殖民地部电》,1938 年 6 月 11 日。见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C. O. 129/57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以下档案出处同。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香港政府缺少难民人数的精确统计, 所引官方材料亦会与事实有所出入。

② 《香港立法局会议报告(1938 年)》(Reports of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Session 1938), 第 64 页。

③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 年)》(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938), 第 63 页。

④ 《香港总督致英国殖民地部电》,1938 年 11 月 3 日, 见 C. P. 129/571/11。

⑤ 《香港总督致英国殖民地部电》,1938 年 12 月 23 日, 见 C. P. 129/570/3。

⑥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 年)》, 第 62 页。

⑦ 迈因斯:《帝国统治下的香港,1912—1941 年》(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 牛津大学 1987 年版, 第 26 页。

港,无不收容。1938年10月以前,香港向所有前来避难的内地百姓敞开大门,但港府在难民入港之初即心怀隐忧,担心中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而地窄人稠的香港无力容纳太多的人口。1937年9月,代理港督史美致电英国殖民地部,称:“广州来的难民已使香港过度拥挤,我正想采取措施抑制难民流入,但我希望不要因此损害香港供人避难的良好传统。”^①1937年12月,港督担心日军即将在香港北部边界登陆,会有更多难民入境,遂向殖民地部表示:“尽管我愿意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为真正的难民提供庇护,但是,考虑到食品供给和公共卫生状况,应该阻止太多难民涌入。”^②由于当时的法规不限制华人移民,所以港督建议公布紧急法令,使他有权限制任何种族的人移民入港。一周以后,殖民地部授权港督酌情控制中国内地难民进入香港。^③

1938年10月广东战事加剧,难民汹涌而来。港督决定运用他所拥有的权力限制难民入境。当时,香港立法局有些议员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允许华人自由进出香港的政策,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加之香港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同中国关系密切,尤其适宜于这项政策。所以,关键问题不在限制移民,而在于科学的城镇计划和新界的经济开发。^④尽管存有异议,香港政府还是于1938年10月13日颁布限制外人人口紧急法令。因为陆上边界无法关闭,港府决定堵截海路进入的难民。负责出入境事务的有关机构订立新规则:每个希望登陆的人至少要有港币20元,无钱不准进入香港。^⑤1938年12月,香港行政局建议将登陆所需的20元增至100元,1939年6月,这一建议付诸实施。^⑥

① 《代理港督致殖民地部电》,1937年9月1日。见C.O.129/563/15。

② 《罗富国致殖民地部电》,1937年12月11日。见C.O.129/563/12。

③ 《殖民地部致港督》,1937年12月17日。见C.O.129/563/12。

④ 《香港立法局会议报告(1938年)》,第153页。

⑤ 李宏编著:《香港大事记》,第76页。

⑥ 迈因斯:《帝国统治下的香港》,第26页。

少增长了 50%，而同期住房增长仅为 8%^①，住房短缺的情形是不难想见的。到 1938 年 6 月，待租空屋均已告罄。于是，那些富裕的外来户以高出原价两三倍的租金求租住房，见钱眼开的房东或者加高房租，或者向原有租户下达逐客令，许多贫穷的香港居民因此流离失所。由于加租迫迁之风日甚一日，香港政府不得不实施《防止驱逐租户条例》以保护房客免受盘剥。^②

(二)文化人士。抗战时期有不少沦陷区的教育文化机构迁到香港躲避战火，或借香港为阵地展开宣传。如毗邻香港的广东省有岭南大学、文德中学等数所大中学校移住香港以求庇护。又如，久负盛名的《大公报》，自抗战以来一直处于流离播迁之中，1937 年 12 月上海版《大公报》又因拒绝日军检查而停刊，其主持者胡政之、张季鸾、徐铸成便来到香港另谋生路。先后赴港的还有主持《申报》的史咏赓、主持《立报》的成舍我、主持《世界知识》杂志的金仲华等人，他们在香港得以继续被迫中断的事业。^③ 时隔不久，《申报》、《立报》、《大公报》等都陆续在香港出版。金仲华、戴望舒、杨潮等人则进入胡文虎系统的《星岛日报》主持编务。1941 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压制民主，大批名教授、名记者从国统区流亡香港。如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茅盾、戈宝权、萧红、胡风等人先后赴港，创刊办报，发展文化事业，就属于这种情况。

随难民潮南下的文化人大多属于内地文化界中精英人士，所以他们到香港以后生活无虞。但是，其事业发展比较艰难。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在英国绥靖政策下，港英当局竭力限制抗日救亡的言论，他们以新闻检查制度钳制抗日舆论的发表，致使内地文化人所办报刊经常被迫开天窗，使报刊面目不佳；其二，内地文化人主持的报刊在风格品味上不太适合香港读者的需求，有时

① 《殖民地大臣就难民问题所做的答复》，见 C. O. 129/570/3。

②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 年)》，第 62 页。

③ 冯爱群编著：《中国新闻史》，台北 1968 年版，第 142 页。

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如保持上海《申报》特色的香港《申报》，只出版一年便告停刊；香港《立报》的名声也远不及上海《立报》。^①

(三)平民百姓。总的来说，平民百姓的生活是比较窘迫的，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安身之处。难民们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当时许多香港人家都接纳了内地难民。无亲友者则租住业已拥挤不堪的房屋。典型的华式三层楼房平时每层只住不到 20 人，难民多时则要住 60 余人。^② 由于人口过度密集，卫生条件迅速恶化，使天花流行，霍乱暴发。1938 年共发生痘症 2327 宗，死亡 1834 人，明显高于往年，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也大量增多。1938 年全年香港各家医院一直过度拥挤。难民恶劣的居住环境，直到香港沦陷时也没有得到改善。^③ 根据 1941 年 7 月的调查，14 个居住单元中住有 497 人，难民需支付一定的租金，处境相当悲惨。^④ 另外，还有少部分难民没有居所。1938 年夏，港岛和九龙分别有 1.3 万人和 1.7 万人流落街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来港难民，其余是当地穷人。据估计，3 万之数应是正常情况的三四倍。^⑤ 1938 年底，新界地区有数万难民露宿荒野。

平民百姓难民在就业方面很不顺利。据香港政府称，1938 年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非常严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⑥ 对于平民阶层的难民来说，能够保全全家性命于战乱年代，就是他们最高的生活目标。

三 香港政府和香港各界对难民的态度

抗日战争以前，香港是华人自由出入境的地区，凡有难民来

① 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台北 1977 年版，第 102 页。

②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 年）》，第 62 页。

③ 同上。

④ 颜德固：《香港沦陷史》，第 12 页。

⑤ 《殖民地大臣就难民问题所作的答复》，见 C. O. 129/570/3。

⑥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 年）》，第 62 页。

港,无不收容。1938年10月以前,香港向所有前来避难的内地百姓敞开大门,但港府在难民入港之初即心怀隐忧,担心中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而地窄人稠的香港无力容纳太多的人口。1937年9月,代理港督史美致电英国殖民地部,称:“广州来的难民已使香港过度拥挤,我正想采取措施抑制难民流入,但我希望不要因此损害香港供人避难的良好传统。”^①1937年12月,港督担心日军即将在香港北部边界登陆,会有更多难民入境,遂向殖民地部表示:“尽管我愿意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为真正的难民提供庇护,但是,考虑到食品供给和公共卫生状况,应该阻止太多难民涌入。”^②由于当时的法规不限制华人移民,所以港督建议公布紧急法令,使他有权限制任何种族的人移民入港。一周以后,殖民地部授权港督酌情控制中国内地难民进入香港。^③

1938年10月广东战事加剧,难民汹涌而来。港督决定运用他所拥有的权力限制难民入境。当时,香港立法局有些议员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允许华人自由进出香港的政策,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加之香港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同中国关系密切,尤其适宜于这项政策。所以,关键问题不在限制移民,而在于科学的城镇计划和新界的经济开发。^④尽管存有异议,香港政府还是于1938年10月13日颁布限制外人人口紧急法令。因为陆上边界无法关闭,港府决定堵截海路进入的难民。负责出入境事务的有关机构订立新规则:每个希望登陆的人至少要有港币20元,无钱不准进入香港。^⑤1938年12月,香港行政局建议将登陆所需的20元增至100元,1939年6月,这一建议付诸实施。^⑥

① 《代理港督致殖民地部电》,1937年9月1日。见C.O.129/563/15。

② 《罗富国致殖民地部电》,1937年12月11日。见C.O.129/563/12。

③ 《殖民地部致港督》,1937年12月17日。见C.O.129/563/12。

④ 《香港立法局会议报告(1938年)》,第153页。

⑤ 李宏编著:《香港大事记》,第76页。

⑥ 迈因斯:《帝国统治下的香港》,第26页。

香港政府一方面考虑并实行限制难民入境,一方面设法救济已经在港的难民。1938年6月,港府决定耗资50万元在北角、马头涌和京士柏公园修建三所难民营,收容市区的5000名难民。难民营的管理和医疗卫生由医务总监负责,并由港督任命的一个委员会从旁协助。难民营中的福利、教育和生产活动由紧急难民委员会负责。^①1938年10月以后,香港政府加快了难民营的修建。港府在八乡搭盖席棚,收容五千余人,后因席子已经用尽,在粉岭地区只好用火车车厢充作难民营,收容三四千人。总计港九、新界地区先后有北角、马头涌、京士柏、荔枝角、粉岭南北两区、锦田和文锦渡等十余处难民营投入使用,其中以京士柏、北角、马头涌和锦田难民营规模较大,容纳人数在一二千人以上。^②此外,广州失守后退入香港境内的1300名中国军人解除武装后,被安置在亚皆老街小山上的难民营中。^③1939年3月,上述各难民营共收容12299人。^④由于难民潮来势汹涌,时间仓促,匆忙建成的难民营极其拥挤简陋,只能供给最低水平的食宿和医疗服务。

香港各界人士对于救助来港难民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各种社会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香港原有一些慈善机构,如东华三院、露宿者保护协会、儿童保护协会、救世军等,七七事变后,又成立了许多赈济团体,其中有华人赈灾会、华商总会辖下的商赈会、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学生界有学生赈济会;妇女界有中国妇女兵灾会、妇女慰劳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妇女大同盟会等。如此众多的社会救济团体相继出现,在香港的难民救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⑤这些组织各尽其能,竭力参予难民救济。1938年香港政府表示:“本年难民问题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各界对于救助难民呼吁

①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第63页。

② 《香港崇正总会救济难民会特刊》,香港1939年版,第145页。

③ 《香港东华三院百年史略》,香港1970年版,第93页。

④ 《香港崇正总会救济难民会特刊》,第146页。

⑤ 《侨团史略》,见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香港1940年版。

的迅即响应。”^①

香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华人慈善机构东华三院为救助难民出力尤多。1938年初,香港政府委托东华三院收容无家可归和无友可投的难民,并借前国家医院、九龙警署、维多利亚监狱等几所建筑物供收容之用。到1938年5月,东华三院共为2648名内地难民提供食宿。1938年底新到的一批难民入境后,东华三院又启用封闭多时的栖流所,供难民栖身。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东华三院还先后资遣三万余名难民返回原籍,或转送广州难民所安置。^②因所耗费用为数不少,东华三院财力不堪承受,只好请求港府援助,所用11万余元后来均由政府开支。^③至1940年,东华三院共资遣难民6073名。^④

由香港政府和社会名流共同负担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负责儿童抚养及教育,收容难童甚多。^⑤

香港崇正难民会自难民再度入港后,即奋起救济。他们在粉岭安乐村轩辕祠内,成立施赈办事处,每日办理施米。前来该处领米的难民,第一周有一万余人,第二周增至二万余人,不久又增至三万余人。1939年10月,宝安再次沦陷,数万难民逃至粉岭一带,崇正会派人前往各处散发粮食,救助难民。^⑥

大量难民入境给香港社会造成很大压力,尤其是赤贫、病残及妇孺难民更加重了社会负担。香港政府为安顿难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耗资财为数不少,这在中英关系史上是值得一书的。香港各界同胞对内地来港难民同情有加,热心救助,充分体现了香港人民与中国内地人民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①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年)》,第64页。

②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年)》,第63页。

③ 《殖民地大臣就难民问题所作的答复》,见C.O. 129/570/3。

④ 《香港东华三院百年史略》,第93页。

⑤ 《香港崇正总会救济难民会特刊》,第148页。

⑥ 同上书,第155页。

四 难民潮对香港社会的影响

由于内地入港难民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难民潮对香港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入港的内地工商业者,对香港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内地迁港企业及投资新办企业,充分利用当时因人口激增而出现的廉价劳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益,一开始就出现了良好的经营态势;另一方面,内地企业家带来了资本和技术,并从上海等地招募技术工人来港,使香港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1936年,香港只有工厂541家,内地工商业者来港后,工厂数目迅速增长。1939年,雇佣2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已达到829家,到1941年达到1200家,共雇佣9万余名工人。^①于是,香港这一传统的转口贸易港,开始拥有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可以说,抗战时期香港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这对50年代的香港工业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于来港避难的平民百姓,他们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贫苦劳工阶层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劳务市场,有助于提高香港工业生产力的水平;其次,难民使香港市场消费需求扩张,这在客观上刺激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仅以牙刷业为例,当时香港牙刷销售量大增,新开设的牙刷工厂就有八九家之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1938年香港政府称,帝国特惠制下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小型工业继续从中国内地转移,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市场需求旺盛,使香港经济获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发展。^②

从政治方面来看,内地文化人士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香港创刊办报,宣传抗日救亡,其政治影响不可低估。据不完全统计,

① 颜德固:《香港沦陷史》,第24页。

② 《香港政府行政报告(1938年)》,第62页。

这类报刊达到一二百种之多。邹韬奋的《大众生活》，茅盾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的《耕耘》，张铁生的《青年知识》，马国亮的《大地画报》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抗战开始后，各种势力都希望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汪伪势力也曾极力争夺这一阵地，他们收买报馆为己所用。当时的《南华日报》、《天演报》、《大公报》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国报纸。由于各方势力竞相渗透，香港文化界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幸的是，大批赴港进步文化人士力持正义，通过各自传媒鼓动抗战救国，所以，从主流上看，香港是一个沟通海内外，传播中国人民正义声音的窗口。还应指出的是，内地文化人所办报刊在唤醒香港民众的民族意识，号召海内外华人共赴国难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文化方面来看，大批文化人赴港，推动了香港文化事业的繁荣。以书店业为例，当时香港的书店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在皇后大道、荷里活道、弥敦道、上海街，书店的招牌触目皆是。^①书店中书报、杂志、画报、小册子多种多样，令人目不暇接。内地高层次文化人士云集香港，从总体上提高了香港文化的品位。香港在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汇的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总起来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流入的内地难民潮对香港社会的冲击及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难民潮的出现，一方面加重了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香港社会注入了活力，从而促使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境地，并为“二战”以后香港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林歌：《香港新书店话旧》，见《香港工商时报》，1939年7月5日。